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反基督七人幫”：1860年《論文與評論》探析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Huang, Yi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7-01 03:47:11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442

“反基督七人帮”：1860年《论文与评论》探析

黄 弋

内容提要：1860年《论文与评论》出版，它对英国社会造成的冲击不亚于《物种起源》。该书的七位作者被正统教派斥为“反基督七人帮”。七位作者在书中批判“圣经无谬”的所谓正统观点，并就基督教如何应对科学的挑战、何为正确的释经原则和方法这两个基本问题展开论述。他们的观点当时被视作离经叛道，后来却被圣经学者视为常识。

关键词：释经思想；《论文与评论》；反基督七人帮

“Seven Against Christ”: A Study of *The Essays & Reviews*

HUANG Yi

Abstract: *The Essays and Reviews* (1860) posed a shock to the British society even greater than *The Origin of Species*. The seven authors of the book were criticized as “Septum Contra Christum”. In the book, they defy the prevailing views of “biblical infallibility” by explaining their ideas of how to meet the challenges coming from the scientific discovery and what are the right 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r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Their ideas explained in the book were regarded as non-religious and noxious to the Christian faith at that time, but are widely taken for granted nowadays.

Key Words: biblical exegesis; *The Essays & Reviews*; Jowett

—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面临着严重的宗教困局,主要表现为基督信仰的动摇以及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上升。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科学的进步,二是圣经评断学(biblical criticism)^①的影响。在当时,对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以及人们对新理论日益增长的兴趣,引发了宗教界的巨大不安。这种来自新科学的挑战随着1859年《物种起源》的出版而达到顶峰。而在宗教领域内部,对来自于圣经评断学的影响,到此时再也不可能熟视无睹了。

对圣经的诠释活动与基督信仰相伴相生。在18世纪之前,神学家对圣经的诠释主要着眼于字面意义,认定经文中的每一字词都精确地描述了真实事件,具有无可辩驳的绝对权威性。而到了19世纪,德国的“杜宾根学派”(Tübingen Schule)开创了近代圣经评断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鲍尔(F. C. Bauer)、施维格雷尔(Albert Schweigler)、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等。该学派深

① 圣经评断学主要分为两大类:历史评断学(historical criticism)和章句评断学(textual criticism)。前者又称为“高等评断学”(higher criticism),主要着眼于对历史环境和条件进行研究,确定圣经各卷的作者、时代、地点、文体、记事与说教的来源;后者又称为“低等评断学”(lower criticism),指的是对圣经的各种抄本、古译本进行研究,调查其年代、谱系,揭示各种差异,并探索产生那些差异的原因。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所谓的高低等之分,并不是就重要性或学问深度的高低,而是指考证范围之广狭而言。参见《基督教辞典》(卓新平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圣经评断学”条。

受黑格尔思辨体系和历史哲学的影响,从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视角出发,对圣经经卷的真伪、版本、作者、背景等进行考据研究。学派代表人物中以施特劳斯的影响最大,在其《耶稣传》(*Das Leben Jesu*, 1835)中,他用神话方法来解释福音书关于耶稣生平的记述,认为附会于耶稣生平的神迹和超自然事件只是反映了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盼,并不具有历史可证实性。尽管斯特劳斯一再宣称他的目的是要剥去福音书的神话外壳,而将隐藏在神话形式背后的基督教的永恒真理揭示出来,但他对福音书所作的这种激进的重新解释,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基督教的传统信仰。^①

对于发生在德国的圣经评断学,英国人知之甚少。可以说,在这段时期,英国社会思想与欧洲大陆的思想潮流失去了应有的接触,英国国内只有极少数人,如柯勒律治(S. T. Coleridge),对兴起于德国的圣经评断学给予认真关注。当时英国国内流行的仍然是正统的“圣经无谬”(biblical infallibility)观点,即相信圣经中从头至尾的一切内容均为上帝之言,是不容置疑的。但到了19世纪中期,这种孤立状态已无法维继。《耶稣传》一书经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翻译,于1846年正式出版,使英国人对圣经评断学有了一定程度的接触与了解。而随着《论文与评论》(*Essays and Reviews*)在1860年3月出版,英国宗教界的主流思想与圣经评断学的直接交锋正式展开。那时英国一批有声望的神学家和教会人士,还继续沉浸在圣经基要主义的教义之中,其思想和态度是前一个时代形成的,他们缺乏宗教反省意识,执拗地固守旧有的视觉原则,即便有改革教会的意向,也根本不会想到传统的教义解释会有什么问题。^②对于那些人来说,《论文与评

① 刘锋:《圣经的文学性诠释与希伯来精神的探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20页。

② Bernard M G. Reardon, *Religious Thought in the Victorian Age: A Survey from Coleridge to Gore*. London: Longman Group, 1995, 59.

论》无异于当头棒喝,给他们造成的冲击不言而喻。著名学者威利(Basil Willey)将《论文与评论》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科伦索(John William Colenso)^①的《摩西五经与〈约书亚书〉的批判考察》并称为“三次大爆炸……强烈冲击了基督教世界的组织结构,让信徒们忙不迭地赶紧跑去寻找避难所”。^②有论者将《论文与评论》称为“英语世界接受对圣经的历史—批判性研究的一个里程碑”,^③它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不亚于《物种起源》,只是该书长久以来并未得到广泛的阅读和足够的重视。

《论文与评论》是由七篇独立文章组成的文集,七位作者中有六人是有神职的教士,而且大多都有牛津背景^④。文集甫一出版,

- ① 科伦索(1814—1883),数学家、圣经学者、南非基督教圣公会自由派教士,自1853年起任南非纳塔尔省圣公会会督,在职终身。他于1862—1879年间就摩西五经和《约书亚记》撰写了一系列论文,认为五经不是犹太人生活的忠实记录,而是在巴比伦之囚后伪造的赝品;《创世记》在数字上矛盾百出,可见圣经未必是可靠的史料。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科伦索”条。
- ② Peter Addinall, *Philosophy an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72.
- ③ 詹姆斯·C. 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上),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6页。
- ④ 七位作者所写的七篇文章分别是:坦普尔(Frederick Temple, 1821—1902,拉各比公学校长,后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世界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the World*)、威廉斯(Rowland Williams, 1817—1870,著名神学家、希伯来语教授)的《本森的圣经研究》(*Bunsen's Biblical Research*)、鲍威尔(Baden Powell, 1796—1860,牛津大学几何学教授、自由主义神学家)的《基督教证据之研究》(*On the Study of the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威尔逊(Henry Bristow Wilson, 1803—1888,神学家、乡村牧师)的《日内瓦的历史演出:国家教会》(*Seances Historiques de Geneve: The National Church*)、古德温(Charles Wycliffe Goodwin, 1817—1878,埃及学家、律师,七位作者中唯一的非教职人士)的《关于摩西五经中的宇宙进化论》(*On the Mosaic Cosmogony*)、帕蒂森(Mark Pattison, 1813—1884,英国国教会牧师、牛津大学林肯学院院长)的《1688—1750年间英国国教思想动向》(*Tendencies of Religious Thought in England, 1688—1750*)、乔伊特(Benjamin Jowett, 1817—1893,牛津大学希腊语教授、著名神学家)的《论圣经的解释》(*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并未引起多少关注。但随着弗里德里克·哈里森(F. Harrison)^①于1860年10月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发表《新基督教》(Neo-Christianity)一文,风暴马上爆发。当时的名人、圣公会牧师韦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②组织了各正统派教会人士共同召开会议,并发表公开信对《论文与评论》的作者加以谴责,将那七人斥为“反基督七人帮”。1862年,威廉斯与威尔逊二人受到大主教法庭审判,在32条指控中,他们被诉犯了5条,主要罪名为否认圣经的灵感性质。之后,二人上诉到枢密院,枢密院以“39条信纲”没有对灵感的解释为由否决了大主教法庭的裁决。这一裁决令正统派大失所望。之后由皮由兹博士(E. B. Pusey)散发请愿书表示抗议;在1864年4月的坎特伯雷宗教会议上,经韦伯福斯提议,主教会议两院多数派共同谴责该书。除此之外,各正统教派还各出一本论文集,反驳“反基督七人帮”的见解。韦伯福斯在其主编的《对〈论文与评论〉的答复》中坦承,他从未读过《评论与评论》。《答复》中的文章基本靠着传统的方法为“圣经无谬”作辩护,表明了当时正统护教论者们相当贫乏的思想状态,也可看出教会上层对科学进步的无知和恐惧。

那些文章的作者们所写的东西,所提倡的批判原则,在今天早已是老生常谈且算不上偏颇,是严肃的圣经学者所必不可少的知识。然而在当时,对于对德国圣经评断学几乎毫无了解的维多

① 德里克·哈里森(1831—1923),历史学家。他早年是国教会派的安立甘宗信徒,由于对新科学采取开放态度而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变成孔德的信徒,成为一名实证主义者。他发文的目的在于对《论文与评论》作者所持的非正统观点表示赞同。

② 韦伯福斯(1805—1873),圣公会牧师,当时最著名的公众演说家之一,被当时的迪斯雷利首相戏称为“滑头山姆”(Soapy Sam)。他以强烈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而闻名。据说在1860年与赫胥黎(T. H. Huxley)的一次辩论中,他问赫:到底是你爷爷还是你奶奶是一只猴子?赫答:我不以自己猴子祖先而感到耻辱,但我为认识一个倾其才能去遮蔽真理的人而感到羞愧!(参见《维基百科》)

利亚时代英国人来说,那些观点却犹如晴天霹雳,让他们震惊不已。

《论文与评论》的作者们希望当时的基督教能够摆脱一种原始的拘泥圣经主义,因为这使得一个人要想既做基督徒又做有思想的人变得越来越难。这就需要现代科学的发展持一种开放态度,并扩大灵感和启示的观念,只有这样,才可能为基督教在科学发展时代找到生存空间。威利指出:“调和基督教与批判,彰显它与时代的智识发展(intellectual tendencies)之间的相容性,从而调和‘有思想的人’(intellectual persons)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论文与评论》的作者们的目的所在。”^①在乔伊特看来,基督教必须敢于面对、容忍一切批判,因为“除非宗教已经表明跟批判是相容的;否则,几年之内,在牛津,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就将没有宗教了”^②。

二

《论文与评论》的七位作者所写的文章虽然内容各异,但倡导的圣经评断原则是一致的。七篇文章所涉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督教如何正确应对科学的挑战;二是何为正确的释经原则和方法。

文集的第一篇文章是坦普尔的《世界的教育》。该文表面看来不具任何激进之处,但其中蕴含着重要的释经方法。坦普尔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幼儿期、青年期和成年期。^③在第一阶

① Basil Willey, *More Nineteenth Century Studies: A Group of Honest Doubt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141.

② Qtd Basil Willey, *More Nineteenth Century Studies: A Group of Honest Doubt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160.

③ Frederick Temple, “The Education of the World”, in *Essays and Reviews: The 1960 Text and Its Reading*. Ed. Victor Shea,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 139.

段,人类直接听从教导和诫令;在第二阶段,人类的知性听命于情感,因而需要某种典范的引导并对其进行模仿;而在第三阶段,人类知晓了“原则”(principle),并以“原则”行事。做出这种区分是为了说明人类处于不断发展中,对世界的理解也在不断增进。从接受直接教导,到最终掌握上帝对人类进行教导背后所蕴含的“原则”,这是人类一个渐次的受教育过程。因此,如果说圣经是对处于“幼儿期”的人类的言说,那么其中必然包含着某些仅仅属于幼儿的东西,对于这部分内容,处于青年期或成年期的人类必然需要加以甄别、舍弃。^①所以他认为,最重要的任务是对圣经进行细致研究,知晓其所教导的和未教导的,而且不必惧怕地质学,不必为圣经文本中的错误而感到不安,因为它们只是让我们理解并剔除那些人为添加进去的本不属于圣经的内容。^②

威廉斯在《本森的圣经研究》中,通过介绍德国人本森的圣经研究来推荐一种历史批判的方法和更加宽泛的启示概念。他认为,启示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口述,更不可能由圣经作者完全加以表达或传达,因为圣经作者们是“有着与我们同样情感的人”,必然会犯错误,因而圣经具有了一种“自然的、会犯错的性质”。^③此外,圣经作者们所使用的语言是人类使用的语言,因而圣经具有一般作品的通常属性。他特别强调,研讨圣经,需要将形象和比喻的语言与科学的语言区分开来。我们不能将隐喻的内容误解为字面上

① 在此,我们可以联系《哥林多前书》13:9-11:“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舍弃了。”

② Frederick Temple, “The Education of the World”, in *Essays and Reviews: The 1960 Text and Its Reading*. Ed. Victor Shea,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 163—164.

③ Rowland Williams, “Bunsen’s Biblical Researches”, in *Essays and Reviews: The 1960 Text and Its Reading*. Ed. Victor Shea,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 194.

的事实,不能将圣经的真理混同于科学上的真理,二者是不同的。他特别警告,圣经无谬性的观点是极其有害的,如果这些明显的谬误还在继续,那么基督信仰就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

古德温在《关于摩西五经中的宇宙进化论》中则指出,新的地质发现、科学发现一再出现,迫使神学家们一次又一次努力去调和摩西五经与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调和的努力是好心办坏事,对于科学探索精神和正确理解圣经都有害无益。因此,他认为,如果要维护圣经的价值,“就不应该以牺牲正确的解释原则、不顾常识为代价,拼命去证明它在科学上是准确的,相反应该承认,它包含着错误的自然观。”^①古德温认为,只要神学家承认摩西五经中的起源论不是科学,而是希伯来诗歌,那么,那种对圣经经文的费力不讨好的解释就完全没有必要。他指出,“神圣启示的目的,并不是要在自然科学方面教导人类,因为人类已经被赋予了在这方面进行认识的自然能力。”^②因此,古德温问道:“假如我们承认,自然科学并非圣经作者们公开宣告要传达的东西,那么,为什么我们在承认他们在这方面会犯错误时,还要犹豫不决呢?”^③

鲍威尔的《基督教证据之研究》可说是休谟的《论神迹》在19世纪的再现。^④他指出,基督教的“实在”(essentials)在昨天、今天或明天,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外部事实”(external facts)则因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之不同而变得不一样^⑤。基督教的证据之

① Charles Wycliffe Goodwin, "Mosaic Cosmogony", in *Essays and Reviews: The 1960 Text and Its Reading*. Ed. Victor Shea,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 346.

② Ibid., 345.

③ Ibid., 370.

④ Basil Willey, *More Nineteenth Century Studies: A Group of Honest Doubt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145.

⑤ Baden Powell, "On the Study of the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 in *Essays and Reviews: The 1960 Text and Its Reading*. Ed. Victor Shea,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 238.

“信服力”(convincingness)因各个时代人类不同的智识发展水平而改变。因此,那些为公众所认同、所期待、所相信的神迹,在昨天可以被用来支持宗教信仰,但今天则可能成为信仰的最大障碍。所以,鲍威尔指出,信仰无关“物质性的神迹”,只与“精神性事实”相关。鲍威尔的观点中最具建设性意义的部分,就在于他对“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区分,也即区分了“科学”与“信仰”两个领域。他指出,“信仰”的证据不可与科学证据相混淆,“真正的证据是精神性的,也只能由精神性的东西来裁决;使徒们并未宣称圣经是一本‘无谬之书’”^①。圣经经文所包含的内容并不需要完全符合当今时代所谓的“科学的真理”,因为圣经作者们根据的并不是“我们的逻辑,而是根据当时的知识发展水平和哲学”^②。在七位作者中,唯有鲍威尔是在文章中提到《物种起源》的人(他在文中称此书为“达尔文的杰作”),并赞同达尔文的理论。在他看来,科学理论能让人类认识到上帝如何通过自然来展示其本身,因此,他内心的信仰会更加“坚不可摧”,而不是因为科学的冲击而开始动摇。

《论文与评论》的发起人威尔逊则在《日内瓦的历史演出:国家教会》一文中为圣经“去神话化”,他区分出“真理”的不同层次。一个故事,可能是神话或寓言,但依然可以代表或传达重要的“精神真理”。“我们不会将‘不真实’运用到寓言、童话或格言之中,尽管它们不与物质事实相符,只与理念相对应”。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真理是第一重要的,而历史真实则不那么重要了。他在文章的结尾说道:

① Baden Powell, “On the Study of the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 in *Essays and Reviews: The 1960 Text and Its Reading*. Ed. Victor Shea,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 249—250.

② *Ibid.*, 250.

耶稣并未启示他的宗教是一种智识的神学,也没有启示他的宗教是一种完全忠于历史的信仰;因此,如果要求个人和教会保持一种教义上的完全一致(这是不可能达到的),或者对历史史实的认识保持协同(这是永远不可能存在的),那是对真正的基督生活的压抑,真正的基督生活在于意识到成为伟大的道德秩序的一部分。^①

帕蒂森在《1688—1750年间英国宗教思想动向》中指出,18世纪的英国“宗教败坏,道德堕落”,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神学,在受到来自柯勒律治的新动力的刺激和新方向的指引之前,几乎已经消亡了”^②。他将这种堕落状况归之于功利主义或过于偏重功利性算计,因为当人以功利算计作为行为的目的时,他得到的不是完美或进步,而是精神上的堕落。他指出,福音派和循道宗之所以在各教派式微时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主要在于这两派认识到,“倡导‘行为称义’并无法阻止罪恶和堕落,因此因信称义成了唯一的救赎真理”。^③也就是说,这两个教派的成功,并不在于其顺应时代的发展,追随所谓的时代精神,恰恰相反,其成功应归于其对功利主义的抵制。

三

在七篇文章中,最具分量的是乔伊特的《论圣经的解释》。在

① Henry Bristow Wilson, “Seances Historiques de Geneva: The National Church”, in *Essays and Reviews: The 1960 Text and Its Reading*, ed. Victor Shea,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 309.

② Mark Pattison, “Tendencies of Religious Thought in England, 1688—1750”, in *Essays and Reviews: The 1960 Text and Its Reading*, ed. Victor Shea,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 392.

③ *Ibid.*, 428.

文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神学家当时所犯的一个最重大错误,就在于将圣经经文完全等同于“永无谬误的上帝之言”,并试图通过各种方法使之符合当前时代的语言和实践。这种对圣经的错误解释给宗教信仰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他在文中倡导一种特殊的圣经解释方法,即历史方法,其基本原则是:像解释其他书那样解释圣经^①。当然,他的意思并非是说,圣经与其他书完全一样,而是说圣经和其他书应遵循相同的解释程序:

释经科学只能是归纳的科学……其基础是圣经作者们的语言、思想和叙述。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常识问题,方法是在解释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圣经是世界上唯一一部在不同的时期、用不同的风格写成的书,掌握在具有不同的知识和教育水平的人手中。^②

乔伊特还特别强调,应从圣经本身解释圣经。他认为,不能简单地理解“圣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重要原则,“不可分割”意味着圣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绝不是说,圣经的各部分都是相同的。《旧约》不能等同于《新约》,福音书也不能等同于使徒书信。他觉得特别有害的做法就是“把圣经中某个部分里表面类似的段落,不分青红皂白地运用到另一些大相径庭的经文之上”^③。圣经各部分因其不同,在理解阐释时必然要求不同的释经方法,不能简单化处理,如不能使用解读摩西五经的方法来解读《诗篇》。

① Benjamin Jowett,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in *Essays and Reviews: The 1960 Text and Its Reading*. Ed. Victor Shea,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 505.

② Ibid., 506.

③ Ibid., 507.

他对他那个时代流行的“受圣灵激发”之说持不同看法,而要抛弃“永无谬误的灵感的”超自然教义。他认为,圣经作者们并没有作任何无误性的宣称:

在福音书作者或使徒们的著作中,没有任何征象说明他们有什么内在的天赋,或者他们受制于什么不同于传教或讲道力量的、外在于他们的力量的支配……他们也未曾在任何地方引导我们去认为他们已摆脱了错误和懦弱。^①

因此,传统神学对圣经的成书过程做出神秘主义解释,认定圣经是经由圣灵激发写成,这种超自然教义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在科学时代已经难以立足了。他欢迎历史评断的研究成果,认为它们并不会像很多人担心的那样会导致信仰的衰亡,相反,这是达成对圣经的正确理解所无可回避的环节,是把宗教从其面临的现代困境中解救出来的关键所在。

对于“什么是圣经”这个问题,乔伊特的回答是,圣经是“我们从对圣经的认识中所汇集起来的思想”。这个定义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如果我们依此考察圣经,就可以承认,圣经是一种包含着各种性质不同的信念和行为的书——是高尚的东西和可怕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和虚假的东西的混合。我们不应当抱着某种关于它应当包含什么东西的先入之见来接近圣经。这样一来,一方面让解释者对圣经作为整体抱有信心;另一方面,也可坦然接受各种可能的关于“圣经中包含着某些错误”的指责。

在文中,乔伊特还提出一种“渐进启示”的概念。他把人类历史比作一种从孩童向成人的进步。圣经对于孩童时代和成

① Benjamin Jowett,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in *Essays and Reviews: The 1960 Text and Its Reading*. Ed. Victor Shea,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 486.

人时代的人类所显示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对圣经的一切认识都“不过是一种准备,为另一种存在而做的准备”。乔伊特并不害怕对圣经进行科学研究,他认为对圣经的解释应当符合科学。

与此同时,他也深信,圣经虽然可当作一本书来读,但它依然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其他书籍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当我们运用批判的原则来考察时,应当注意:

圣经仍然显得与别的书都不一样,它的美将被人们以新鲜的眼光看待,正如一幅画,在许多年代之后被复原为当初的状态一样。它将引起一种新的兴趣,并且凭借内在的力量,为自己带来一种新的权威。^①

乔伊特在圣经里重新发现的“权威”,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圣经的“生命”,本质上就是仿效基督之道德榜样的生活。在他看来,正是这种生活成了打开圣经的释经钥匙。他认为,也许在未来,对神迹的信仰可能被抛掉,上帝的人格性可能被抛掉,教义也可能变成无意义的话,但是宗教的本质将留存下来。在此,他将宗教的本质等同于道德。他指出,基督的本质就是一种“绝对道德”,这种道德与柏拉图所倡导的道德本质上无异。信仰不“依赖于历史事件……神圣的源头不在历史,而在他处”。这个“他处”正是道德领域。他在晚年就此问题说:

我想,我越来越相信基督教了,当然我不是指我更相信神迹、地狱,或者更相信圣灵激发或救赎,我的意思是我更相

① Benjamin Jowett,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in *Essays and Reviews: The 1960 Text and Its Reading*. Ed. Victor Shea,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 525.

信为他人而活,并不断行善。^①

四

19世纪下半叶欧洲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章,乃是科学与神学之间的冲突。如何面对科学的挑战,是关系到基督教生死存亡的问题。神学家霍吉逊(Leonard Hodgson)正确地指出,对于这种挑战,教会必须应战,而且“应战的唯一诚实的方式,就是鼓励神学家让圣经去接受最为严厉的批判。舍此别无他法,而且今天我们应该感激那些有足够的信念去做这件事的人”^②。《论文与评论》的七位作者正是属于后人应该感激的那一批人。“他们发现自己一直视作信仰之根基的东西,竟然充满了流沙。为此发现,他们经受了那个时代施加的难以承受的重压;但他们依然有足够的信念和勇气去挖掘、去筛选,直到抵达他们当时能够站立其上的坚实地面为止”^③。他们拒斥正统教义,并非因为缺乏信仰和道德准则,恰恰是源于对基督真理的强烈信念。

虽然《论文与评论》在其出版时引起正统教会人士的声讨和起诉,但这种新思想经过时间的洗礼,渐渐获得认同,甚至成为学识。二十几年后,克赖顿(Mandall Creighton)在就任剑桥大学教会史讲座教授的就职演讲中说:“神学变成历史性的,它并不要求历史变成神学性的。”^④显而易见,到了此时,“反基督七人帮”所倡导的“将科学方法引入神学探索”的原则,已经不是什么令人诧异的事情。就此来看,“《论

① Qtd., Basil Willey, *More Nineteenth Century Studies: A Group of Honest Doubt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141.

② Leonard Hodgson, *Biblical Theology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7, 16.

③ Ibid., 17.

④ Bernard M G. Reardon, *Religious Thought in the Victorian Age: A Survey from Coleridge to Gore*.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71, 255.

文与评论》一书具有双重意义,从科学上说,它是英语世界接受对圣经的历史—批判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从公众影响方面说,它有助于把神学问题介绍到受过教育的公众之中,也有助于造成一种对宗教信仰之种种差异的更加开明的态度”^①。而对于《论文与评论》的作者们,利文斯顿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虽然他们的工作——

看起来主要是否定性的,但是他们对于基督教思想在一个科学革命进步的时代,还是做出了难以估价的贡献。在教会内学术自由一度受压的年代里,他们在复兴这种自由方面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如果说他们的工作太具破坏性了,那么我们可以争辩说,当时正需要这样的武器,来打碎信仰不久前被建立于其上的虚假基础。最终将其重建在“更深基础”上的工作,将留待另外的人来完成。^②

这些作者能够坦然接受德国圣经研究的成果,并积极应对科学的挑战,他们的根本目的在于,将基督真理立于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为基督教求得在现代社会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有效依据。应该说,《论文与评论》使宗教自由主义在英国神学界占有了重要而稳固的地位,其影响力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大。总而言之,《论文与评论》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开启了英国神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确立了基于历史评断的释经学,像后来的剑桥学派(Cambridge school)^③就是沿着这条路径推进其神学研究的。

① 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上),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6—417页。

② 同上,第440—441页。

③ 剑桥学派由一批执教于剑桥大学的神学家组成,其代表人物包括韦斯科特(Brooke Foss Westcott,1825—1901)、霍特(F. J. A. Hort,1828—1892)、莱特富特(J. B. Lightfoot,1829—1889)等。该学派的主要贡献在于《新约》研究方面。霍特与韦斯科特以其共同编撰出版的评论本《新约:希腊语版》(1881)而闻名。

作者黄弋,江西赣州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博士,任教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主要研究英国文学、圣经文学,近期发表论文《柯尔律治文学释经思想探析》(《外国文学》2013年第4期)。

(执行编辑 王鹏)